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明代文学研究

名誉主编

主 编

季羨林

本卷主编

张燕瑾 吕薇芬 邓绍基 史铁良

撰 著

史铁良 陈立人 邓绍秋

北京出版社

出版说明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是 20 世纪的中国学者对上古至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文学的研究成果总汇，是中国文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在世纪之交出版这套丛书，从历史的进程中确认规律性的成果，并进而为全球化格局中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由季羨林先生任名誉主编，张燕瑾、吕薇芬先生主编。丛书依据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脉络，分为 10 卷 12 分册。其中隋唐五代卷、宋代卷各分二册，约 100 万字。其余各卷均为一册，约 50 万字，丛书近 600 万字，相信有关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都已网罗无遗。

为了确保丛书的客观性、学术性、权威性，丛书主编及各卷主编、作者及全体编辑人员付出了数年艰苦的努力。丛书的编校大致遵循以下原则：

- 一、关于引文。在准确科学的原则下，引文尽可能保持原貌，除明显的文字错讹外一般不径作改动。
- 二、注释一般采用脚注。某些目今稀见的版本注明章节；个别成果总括性文字较为集中时，图书的版本或文章之出处可随文说明；引用次数较多的著作可以章为单位，在一章中首次出现时标注作者、书名、版本、页码等，再出现时则可简化处理。
- 三、规范用字与标点符号。一般原则应改异体字为正体

字，繁体字为简体字，但遇特殊情况可斟酌处理，譬如人名。标点符号的使用皆以 1996 年 6 月 1 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为依据，对引文末尾的标点符号，则根据具体情况处理，以合情合理为原则。

四、数字使用。公元纪年统一用阿拉伯数字，每一朝代及干支纪年统一使用汉字，其他数字用法根据需要进行行文流畅得体为原则酌情处理。

总之，本书编辑思路是：方便读者，保证质量，遵守规范，同时以科学、得体、合理为大原则。不妥之处，欢迎批评。

北京出版社文史编辑部

2001 年 12 月

序

季羨林

我们眼前正处在一个新的世纪末中，20 世纪的世纪末；再过三年，一个新世纪就要来临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各行各业都应当回顾一下，回顾过去九十多年中我们的所作所为。世人人都知道“鉴往知今”的重要意义。鉴往决不是什么“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知今”，而且两者都是为了预测未来，以便把将来的工作做得更好。人类总得随时有所创新，有所前进嘛。人类社会永远不会停滞不前的。

而且眼前不仅是世纪末，而且是千纪末，其意义当然与一般的世纪末迥乎不同。世纪和千纪，都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与大自然的年不同。没有耶稣，哪里来的世纪和千纪呢？可是一经创造出来，它们对人类的思维和行动就产生了影响，历史事实和眼前发生的事情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无须赘述。

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包括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人，决不能例外，我们也要回顾一下，前瞻一下，预测一下。我们这一套《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就是回顾，回顾过去将近一百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情况，收获在哪里？成功之处在哪里？还有没有不足之处？如果讲成绩，如何进一步发扬光大？如果讲不足，又如何加以避免或弥补？总之，我们要回顾的问题多得很；但是，主要讲的是成就，因为成就确实是十分辉煌的。

但是，正如我在上面所说的那样，鉴往为了知今，知今为

了预测未来。在中国文学研究的范围内，在那即将来临的新世纪中，我们主要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我们现在常讲“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但是，在中国文学中优秀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这一点，我们在鉴往回顾时应该结合今天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弄个清楚，然后弘扬才有目标，才有根据。

我个人认为，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至少有两件事可以弘扬，这都是中国文学中独特优秀之处：一个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一个是中国文学独特的艺术性。近二三百年来，自从西方兴起产业革命以后，西方文化主宰了世界，最显著的表现是在科技方面。西方思想的核心是“征服自然”。“征服”的结果是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利，衣、食、住、行四个方面都包括在里面。这一点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否定的。但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灾殃，比如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臭氧层出洞，自然资源匮乏，人口爆炸，新病丛出，等等。所有这些弊端都威胁着人类生存的前途，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切不可等闲视之。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惟一的办法就是以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就是要与大自然为友不要为敌的思想济西方“征服自然”的思想之穷。倘若真正付诸行动，人类庶几能有更加光明的未来。“天人合一”思想基本上属于哲学范畴，但是文学中也会包含着这种哲学思想的。因此，在未来的中国文学研究中，我们必须有意识地着重探讨这种思想，弘扬这种思想。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东方其他国家也有；但以中国为最显著，最突出。可惜我们有时也没有做到，因此，即使是在中国，这种思想也必须大力弘扬，何况是对西方呢？当年鲁迅先生曾提倡过“拿来主义”，就是要把西方的好东西拿过来为我们所用。现在，我认为，我们应该提倡“送去主义”，就是把中国的好东西送给西方，让他们也能够得到好处，这是第一件好事情。第二件就是中国文学独特的艺术性，比如一些诗

句只有名词，没有动词，等等。美国诗人 Ezra Pound 曾试图模仿。这种艺术性，外国诗人和学者极难理解；但倘若介绍出去，也可能丰富西方创作的表现能力和艺术魅力。

我们在未来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可做的事情还很多，以上不过是几个例子而已，希望中国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家和外国的专家能共同努力，互相沟通，使中国文学研究在新的世纪大放异彩。是为序。

1997 年 4 月 4 日

前 言

吕薇芳 张燕瑾

20 世纪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社会变化大，发展最快，其过程也极其曲折复杂，既有昂扬奋进、慷慨悲歌，也有荒诞滑稽。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在这时代的浪潮中思索、探求、觉醒、创造，推动着学术的发展，也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这一个世纪是一个关键和重要的世纪。在这百年之中，中国从贫穷、落后、封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发展成独立自主的、强大新兴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社会的巨大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观念形态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学术领域，也经历了转型、发展变化的过程。

20 世纪的文学研究，是从传统的古典型向科学的现代型转化的过程，它与中国社会的转型同步。这种转化的一个明显标志是文学研究从边沿不清、文史哲不分的传统学问中剥离出来，成为一种有独立品格的现代人文科学。这种转变是全面的，从文学观念到研究方法，从思维方式到表达方式都有巨大的变化。转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渐进的、积累的、曲折反复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过程。大致说来，这一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从世纪之交至 1919 年的五四运动是起始阶段；五四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发展阶段；从 1949 年至 1978 年是学术一统化阶段；1978 年至今，是学术多元发展阶段。这样的阶段划分，是根据古代、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研

究的发展情况而做的大致划分,但文学研究的情况复杂,这样的划分也许不尽妥当。后两个阶段的划分,分歧应当不大,问题在于一、二阶段的划分。之所以将五四作为第二阶段的起始,是因为五四运动中,不但输入了新的文学思想和观念,介绍了不少新的文学研究方法,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与古典文学很不同的新文学。然而,五四运动毕竟是一个政治运动、思想运动,而学术思想的成熟、学术成果的产生是需要时间的。因而,徐公持先生将百年来古典文学研究发展的第二阶段,划分在1928年(《四个时期的划分及其特征——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近代化进程论略》,载《百年学科沉思录》,《文学遗产》编辑部、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9月);陈伯海先生将中国文学史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划分在1923年左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学之检讨》,出处同上),都是很有道理的。至于文学研究大学科下的各小分支学科,又各有各的具体情况,如本丛书的词学研究部分,将第二阶段,即词学研究初步繁荣阶段的起始,定在1930年左右,也是以词学发展的具体情况作为依据的。所以说,上述的阶段划分,只是一种大而化之的划分,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丛书时,能注意到这些纷繁的情况。

起始阶段是现代思想观念在中国继续传播和扩大其影响的时期(现代思想观念在19世纪后期已开始在中国传播),也是文学研究开始走向现代化的科学研究道路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文学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受西方文学思想、文学理论的影响,“文学”这一学科概念逐渐科学化。中国古代的文学,往往与文章同义,其涵义很广泛,不但包括诗、词、赋、曲、小说,也包括了政论文、书启、考释乃至哲学论文、章奏、策论等等,其范围大致与《昭明文选》所选录、分类的范围相同,可见文学观之渊源深长且

牢固不变。但是在历史发展的大形势下，在社会转型的关头，文学观念不可能不发生变化，文学逐渐从文史哲不分的“文章”中剥离出来，有了比较科学的内涵和外延。其次，俗文学（指与诗、词、文、赋为主的雅文学不同的、历来受轻视的小说、戏曲、说唱、民歌等）地位大大提高。这一情况的发生，一方面固然是因为20世纪以来，国门渐开，受到世界潮流的影响，另一方面，自戊戌变法失败后，资产阶级维新派以及国内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发动民众、开启民智的重要性，从思想上强调了中国固有的民本思想，也比较容易接受西方的民主、民权思想。因而就发生了中国文学史上特殊的现象，即文学革命不是从地位很高、渊源深长的雅文学开始，首先提出的却是“小说界革命”的口号。由于当时小说、戏曲界线不太分得清，“小说界革命”实际上包括了戏曲界革命。

从当时整个文学研究领域来看，应该说还是经学与桐城派文章学占统治地位，注疏、评点、诗话、词话、版本整理仍是文学研究的主要手段。但是，应该看到，文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梁启超等“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主要针对的是文学创作，但是为了鼓吹小说革命，梁启超等人写了不少文章论证小说的社会功能，这些文章虽然在理论上还不成熟，在文学观念的改变、方法的更新上不很自觉，然而却与传统的评点、考据的方式不同了。梁启超等人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原有其政治目的，但这并没有对维新派的大业有什么帮助，倒是使中国文学研究走上了现代化、科学化的道路。真正自觉引进现代科学的文学、美学观念与研究方法的，是王国维。他于1904年写出《红楼梦评论》，以全新的视角，用美学与哲学观点分析文学作品，这在我国文学研究史上是真正意义上第一次用现代科学方法所做的尝试。此后，他在1908年发表的《人间词话》，1913年发表的《宋元戏曲考》，

都体现了东西文化的交流、碰撞与融合，意味着文学研究向现代化、科学化的转型。

第二阶段共三十年，又可分为两个段落：前十年与后二十年。前一阶段虽说从 1919 年算起，然而文学观念却在此以前逐渐演变着，尤其在 1915 年《新青年》杂志创刊以后进程更快。五四运动后，在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精神的鼓动下，在对旧封建文化的批判的同时，新的文学观念趋于形成，如“平民文学”的思想、“为人生”的文学思想等，而在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提出的文学进化观念最有影响，为当时学界普遍接受。进化观在现在看来，似乎太过简单幼稚，但在当时却是一场革命。中国长期不变的宗法制农业社会，派生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历史观，从而又形成了文学领域的复古主义思想，当某种文体的发展走进死胡同后，文学家便回过头去，认为复古才是振兴之道，即便想要变革，也须打起复古的旗帜。因而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是发展进化的，这无疑是对旧历史观的否定，把文学研究引入现代科学的轨道上来。当然，文学进化观有其局限的地方，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在研究方法上来看，当时普遍使用综合归纳的方法，而胡适、顾颉刚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也很有影响。这一阶段中，胡适与鲁迅的小说研究最有成就，至今对治小说的学者仍然多有启示，这正是因为他们将研究纳入了现代科学的轨道。还应当看到，在对旧文化、旧文学的批判中，新文学诞生了。新文学不但载体不同——用白话文写，而且从思想内容到文学形式，都与中国的旧文学作品不同。随着新文学的诞生，接着自然产生对新文学的批评和研究，这些批评和研究与古代文学的研究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大致说来更西方化、现代化一些。以上是前十年的大致情况。

自 30 年代起，文学研究向深、广两方面发展。所谓

“深”，指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摆脱了五四初期对传统文化的一概否定，而能冷静地思考传统文学的价值，用历史主义的观点做深入的研究；而新文学的创作很自然地出现不同的创作倾向，也引起新文学即现代文学研究者的严肃思考。另一方面，对西方的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也有了更深、更冷静的分辨力，不是盲目接受，而是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建设自己的学科，踪迹王国维、胡适、鲁迅所开辟的学术之路继续开拓。在“广”的方面，不但指研究领域的拓展，还应该看到在研究方法上的多样化，除了实证的研究方法外，一些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如神话学、民俗学、心理学等方法都得到了使用，闻一多的古代诗歌研究，就体现了这一点。又如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综合研究也开展起来了，陈寅恪、钱锺书就是这方面的大家。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唯物史观进入文学研究的领域，而且逐渐代替了文学进化观。这可以说是文学研究现代化、科学化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也是必然的发展，因为进化观毕竟不能将复杂的文学现象以及文学发展史上各种不同的社会因素的影响与迂回曲折的发展轨迹解释清楚。运用唯物史观来阐释文学的发生、发展，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去阐释文学发展的一些规律，无疑要比文学的进化观念更加科学。然而，文学毕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不仅是历史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反映，还是人的心灵的颤动和智慧的结晶，因此对文学的研究应该是多视角、多方面的，其方法也应多元的。唯物史观在文学研究领域的运用，在这一阶段已趋于成熟，出现不少有分量的著作。但也应看到，有些学者出现了某些庸俗社会学的倾向，说明他们对文学的实质还缺乏认识，产生生搬硬套的做法。现代文学在这一时期已经独立成为一门新学科，同时形成多元化的研究局面。30

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和重庆对文艺界的领导，延安解放区的建立，使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文艺界和学界得到广泛传播，使现代文学的研究比古代文学的研究，出现更多的新气象。

总之，第二阶段是学科建设并获得深入发展的阶段。学科建设可分为基础建设与理论建设两个方面。基础建设指资料的发现、搜集、考订和整理出版，这在古代文学领域内，成绩卓著，而郑振铎是最有贡献的学者。理论建设包括理论研究专著和论文、文学史实和现象的考辨、文学史的编写，还应包括研究领域的开拓——这是学科的拓荒工作，等等。在这一阶段中，出现一大批有才华、有创造力并有鲜明学术个性的学者，如鲁迅、胡适、陈寅恪、郭沫若、沈雁冰、闻一多、朱自清、郑振铎、刘大杰等，梁启超在20年代也写了有分量的学术论文。这些大师的著作为学科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阶段是学科发展的一统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出现欣欣向荣的气象，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都乐于接受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尝试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研究学术问题。文学研究领域的情况也是如此，并产生了一些科研成果。然而自1949年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频繁：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及对胡适派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1955年，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并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肃反”运动；1957年，反右派斗争，并批判右派的学术思想，等等。这一系列的政治批判运动常使学界困惑，也使不少学人成为批判对象，甚至成为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自1957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和阶级分析法，在学术领域一

统天下，到 60 年代中、后期，实际上已对科学马克思主义做了错误的理解和阐释，而以政治运动作支点的学术批判运动，使学术逐渐丧失其独立的品格。自 1966 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正常的学术研究处于停顿状态，学术队伍受到空前的摧残。

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有生命力的，它有助于揭示文学流变与社会经济、政治变动的内在联系，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和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对于文学研究来说，这些都是重要的课题。但如果加以简单、狭隘的理解和运用，就容易导致思维模式的定向化、逻辑推理的直线化，将复杂多变的文学现象简单化。加之政治运动对学术的冲击，影响了这一时期文学研究的发展。但是，这一时期的成绩仍然是不可忽视的。

文学研究领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理论研究、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文学普及工作。在理论研究方面，1949 年以后出版了大量著作，其中有不少是 1949 年以前已成名学者的成果。一批年轻的研究者，虽然知识结构、思想方法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他们中的佼佼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上，比较纯熟，也有不少成果。还应该看到，思想批判运动、尤其是理论性较强的讨论，如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问题、中间人物问题等等，虽然有“左”的负面影响，但对问题的深入思考，对思想方法的锻炼，不无好处，尤其是当时的中青年学者，经过一番思考和磨炼，渐趋成熟，到了 80 年代，他们成为学界中坚。在理论研究方面，成绩显著的是文学史的编写工作。编写工作往往采取集中全国著名专家，成立班子，集体编写的方法，这一方法当然不是惟一的方法，但在当时却行之有效。不少文学史和理论教材，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水平，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和文学普及工作，则以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成就最大，如郑振铎主持编辑的《古本戏曲丛刊》一至四集，后来又由何其芳主持编辑的《古本戏曲丛刊》第九集，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写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中华书局出版的一套《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等；近代文学方面，有由阿英（钱杏邨）编写的《晚清文学丛钞》九种、《晚清文艺报刊述略》、《晚清戏曲小说目》，为近代文学研究打下了基础；文艺理论方面，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及内部出版的《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现代文学方面，有由周扬、柯仲平、陈涌、康濯、赵树理、欧阳山等先后参加编选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开始出版的《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共8集，1966年前出版3集）等等。这些文学研究基本建设方面的工作，不仅为理论研究提供可靠的依据，而且本身也极有意义，有长久的生命力。普及工作则主要指古典文学的选注工作，1949年以来，由名家选名作，如余冠英《诗经选》和《汉魏六朝诗选》、朱东润《左传选》、王伯祥《史记选》、马茂元《唐诗选》和《楚辞选》、钱锺书《宋诗选注》、冯至《杜甫诗选》等等，体现了相当高的学术水平，乃一代盛事。平心而论，在第三阶段，资料整理与研究和文学普及工作，比理论研究的成就要高，当然，在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四领域中，情况不尽相同，这里不暇细论。

第四阶段是文学研究多元化发展时期。这一阶段自1978年至今，二十多年时间不算长，但发展之迅速，变化之大，令人惊叹。这一阶段首先做的，是对上一阶段，尤其是“文化革命”时期的偏差和谬误进行廓清和反正，包括理论观念，对作家、作品的重新评价，对一些批判运动的反思等等，与此同

时，也是对研究者的学术思想的解放和调整，经过纠偏和廓正，为学术的多元发展做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多元发展的态势大约是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的，至今已形成规模。这一时期的特点，大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首先是文学研究观念的变化发展。20 世纪以来，文学观念、学术观念的变化不可谓不大。世纪初，文学从文、史、哲不分的杂文学剥离出来，使文学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学术思想也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循环观、复古观解脱出来，用文学进化观念、唯物史观来考察、研究文学现象。1949 年之后，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研究文学，注重的是社会政治、经济对文学的影响，用阶级分析的眼光去审视作家，分析作家的思想。而到了第四阶段，学者们的文学观念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变化，认为文学不仅受政治、经济的影响，不仅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自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它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部分，是一种文化现象，要读通它不能只用一种眼光，只依靠单一的工具。它又是人文科学的一个分支，与其他学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文学作为独立的学科，自有它独特的地方，并有自身的发展规律。这一观念的变化，应该说更科学，更进步，它是文学研究多元发展的基础，促使文学研究形成新的格局。

其次，文学研究理论工具的多元化，在方法论上取得重大突破。这一阶段，文学理论的探讨日趋活跃，如文学发展的动因、逻辑、轨迹，文学演化的形态，中国文学的民族特质，文学与生活，文学形象，想像与真实，人物性格的构成等等。多方面的探讨和研究，使各种学说和理论，如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文化学、美学、宗教学都被尝试作为解释文学现象的理论武器，而西方现代方法论，如系统论、原型批评研究、符号学研究、结构主义研究、文化批评研究等也被引进

和使用。应该看到，是思想观念的变化，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变革，随着社会的发展，思想观念的变化，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是不可避免的。20 世纪内研究方法大变革，大致有三次：五四时期引进西方与日本的研究方法；1949 年之后，引进俄国 19 世纪民主主义文艺家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的批评方法及苏联的文艺批评模式；80 年代中兴起的“新方法热”，不但像弗洛伊德、叔本华等人早在三四十年代已被中国学者使用过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至此卷土重来，而且还引进不少当代新的科学理论，如系统论等。这三次方法论上的大变革，都是社会发展所引起的思想观念的变化决定的。前两次变革已有定论，不必赘论，倒是 80 年代的“新方法热”，还颇有些争议。这是因为当时“新方法”蜂拥而至，被不加消化、不加选择地套用，形成一种“时尚”，并且在一时间内，出现了浮夸的学风。其实这种情况是对“文化大革命”十年思想禁锢的一种反动，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一热潮以后不久，很多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进行了严肃的讨论和反思，浮躁的学风被遏制，代之以对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研究与思考。应该看到，“新方法热”虽然有过热和浮浅的方面，但它开人眼界，打开研究思路，其功仍不可没。到了 90 年代，原先的唯物史观经过拨乱反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仍然是文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实学”的崇尚使资料的研究取得可观成就，与此同时，新的研究方法经过消化、融通，渐趋成熟，学者们根据各自的学养和研究方向、研究体会，用新视角、新方法写出不少有分量的著作。至此，多元的研究方法已成格局。

第三，研究领域大大拓展。这一方面表现在研究面的扩大延伸：很多以前不被人注意的二三流作家，或艺术上有成就而政治上、人品上有污点或争议的作家，得到应有的重视；以前虽已建立却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学科，如神话研究、少数民族

文学研究、民俗与民间文学研究等，在这一阶段得到长足的发展；一些研究禁区，如胡风研究等被打开。另一方面，还将文学研究与别的学科打通，开拓了许多边缘性的、跨学科的研究课题。这一方面的拓展，意义重大，使研究者能将自己提升，不局限在文学这一领域内考虑问题，而融入其他学科的观念和方法，眼界放宽了，思路打开了，研究也能向纵深发展，这对学科水平的提高、学科体制的改善，有很大好处。

这一阶段虽然只有短短二十几年，但是学术成果却远远超过20世纪任何一个阶段，无论是古代、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的学科研究，或是从另一角度——理论研究、资料整理研究、文学普及工作来看，发展都很快，成果都很大。学术刊物如雨后春笋，学术论文令人目不暇接，而出版的学术著作，因出版社多，发行渠道多，更有不能罗致之感。这些成果在短短的序言内无法一一列举，望读者能细读本丛书。

这一阶段发展很快，却也有它不成熟之处。首先应该肯定，出现了为数众多的优秀学术论文与学术专著，对学科的深入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但是，还有更多的论文和专著，却是在同一不很高的层次上的重复。与此同时，表现出急于求成的浮躁学风，即使在最需要踏实细致的资料整理研究领域内，这种学风也有所抬头。其次，学界正常的讨论、争论、批评与反批评，没有很好展开。学者们往往是各自埋头于各自的课题，学术讨论会则常是各自宣读自己的论文，书评是褒扬多，提出的问题少。其实，批评、争论、修正、完善，是学术界正常的风气，只有这样，才能更好促进学术的发展。第三，学术规范不够完善，尤其是在征引前人的成果方面，往往有所忽略。这不仅是操作上或技术处理问题，而且是对他人的劳动不够尊重。更重要的是，学术发展是一种累进的过程，无论是什么样的天才，都不可能离开前人的成果而凭空创造。因此重视他人